

刘体智和他的旧藏甲骨

贾双喜

甲骨文是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中晚期的文化遗存,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历史纪实,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是稀世之宝。商代传世史料极少,人们对这段历史极为模糊,就连2500多年前的孔子也感叹道“文献不足征”。因此,就有人认为西周以前的历史是靠不住的。甲骨文被发现后,商史有了可靠的征信材料,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同时也提高了先秦文献的史料价值。甲骨文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为商史、古文字学、古代自然科学、古代宗教等研究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商人非常崇尚鬼神,其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随后把占卜验证的结果或相关记事刻在甲骨上,其文字称甲骨文。甲骨文从它被发现之初的私挖乱掘到其后的科学发掘,已出土的甲骨数量在15万片左右,是目前发现最早和较成熟的文字[1]。虽然说是殷王室进行占卜的记述性文字,而且存在形式呆板、字句简单、识读困难等局限,但对的商代历史研究仍是极为珍贵的史料。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也为中国文明史已逾5000年这个事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已出土的甲骨其中绝大部分珍藏于国内的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有少部分藏在私人手中,也有部分流散到国外,成为中国的海外遗珍。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甲骨35651片,约占出土总数的1/4,是中国国内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公藏单位。在这35651片的甲骨馆藏中,有罗伯昭、孟定生、罗振玉、郭若愚、胡厚宣、刘体智等私人的旧藏,也有“庆云堂”、“尊古斋”、“粹雅堂”等斋堂店铺的旧藏。其中收藏数量之多、保存条件之好、资料性之丰,则属刘体智的旧藏。

前不久,笔者因为工作需要拜读了胡厚宣先生的《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一文。现仅借刘体智旧藏甲骨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之便,就刘体智其人、与刘体智旧藏甲骨相关的几个人和胡厚宣先生文中提及的一些问题等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 刘体智其人

刘体智(1879—1962)安徽庐江(今合肥)人。近代收藏家,字惠之,后改晦之,号善斋。清末以父荫任度支部郎中,后任大清银行安徽总督办。1919年至1935年从事银行业。曾任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中国实业银行的总经理。以后便闲居上海,并专心于甲骨、金石、古籍以及各种珍玩的收藏。全国解放以后进入上海文史馆工作,潜心于文字音韵学与文物考古研究工作之中。刘体智出身晚清淮军将领之家,其父亲刘秉璋(1826—1905)是清末淮军重要将领李鸿章手下的重臣,官至四川总督。刘秉璋有5个儿子,即:体乾、体仁、体信、体智、元之。刘体智在家中排行第四,从小天资出众。其父凭借与李鸿章的上下属关系及私人交往,很小就把刘体智过继给李鸿章作了义子。这使刘体智有了被送入天津李鸿章家的私塾中与李氏诸弟子一起读书学习的良机。严师的教诲,弟子之间的交流使他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方法,与李氏门生故吏之间隔代的交往使他学识广泛,博才多学。刘氏从祖辈上就有藏书的传统,在刘体智的老家安徽省无为就有专门用于藏书的楼阁,因牌匾曰“远混天碧”故取名“远碧楼”。“远混天碧”取自我国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之一《永州韦使君新堂记》中“迤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谿门之外”。这段话的原意是永州刺史韦彪建造新堂以后,新堂近处的绵延的绿野,同遥远的蓝天连成一片,它们都聚会于楼门之外,新堂与天然景色浑成一体,美丽特异尽在不言之中,这里从外表看主要的是在突出其自然、天成,不着人工斧凿之迹,但更多的是寓意着藏书者的宽广的胸襟和生存于自然又融于大自然的思想意境。刘氏的祖辈藏书四、五万卷,有《远碧楼书目》存世。刘体智在上海从事金融实业之余还雅好收藏,他继续发扬祖辈的藏书传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特意在上海的新闻路上新建成一飞檐式二

层楼阁用于藏书，取名为“小校经阁”。刘体智的收藏以殷商甲骨、三代青铜器、少量宋版善本古籍、各朝古钱币及明版善本古籍为主，以书画瓷器、秦汉玺印、汉魏名碑、明清精墨、名人名砚等为次。关于刘体智的收藏，从近人王澐《续补藏书纪事诗》六三“刘体智”篇及诗注中也可以得到认识，其诗曰：“经校残编束高阁，铭传小录有善斋。闻道曾藏宋元本，碑友太原谓致佳。”诗注曰：“与乃兄会之（体乾）自小即沉浸于版本、金石之学。家有小校经阁，藏蜀石经孤本。余少时，即闻吴中征赏斋碑友王吉园言其为刘氏搜集古器物外兼及宋元版本。吉园仅言其所藏宋元版本致佳。老于沪上者，必能知其所藏何书也”[2]刘体智善文字音韵，长训诂考据，著有《说文谐声》、《说文切韵》、《说文类聚》、《尚书传笺》、《礼记注疏》、《异辞录》，又有《元史会注》、《清代纪事年表》，还有《善斋彝器图录》、《善斋吉金录》、《善斋玺印录》、《善斋墨本录》、《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在刘家还有一个以藏书而著名的人，叫刘声木。刘声木（1878—1959）原名体信，字十枝，号下愚，精金石、碑版、古物之学。刘体智之兄。他的藏书楼叫“苕楚斋”，藏书以清人著作为主。虽说从收藏总体上讲，它既不能与其父的远碧楼相比，也远不如其弟刘体智的小校经阁，然而其独有的藏书特色，却享誉学界。他的有关楚辞类的藏书，就被郭沫若称为海内第一。有《苕楚斋书目》存世。著有《寰宇访碑录校勘记》、《续补汇刻书目》、《桐城文学渊源考》、《御批通鉴辑览五季纪事本末》、《苕楚斋随笔》等。

二 刘体智的旧藏甲骨

刘体智在国家图书馆的旧藏甲骨现共有28450片，是国内外私藏甲骨中最大宗者。这批甲骨是在1953年的夏天售归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1958年又由该局拨交给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这28450片甲骨被分装在150个拉盖式木盒中，木盒盒身选用上好的红木制作，配以用红木作框、核桃木作心的盒盖，显得十分的雍容华贵，光彩夺目。在每个红木盒中又装有数量为4、6、8不等的蓝布面纸盒，盒内装有用棉垫作铺盖，数量不等的龟甲兽骨。每个蓝布盒中配有一张硬纸片，纸片上画有甲骨的形状轮廓，并注明每片甲骨所属善斋编号和北图的编号，还在蓝布面的纸盒标签纸上标明红木盒号、蓝布面纸盒号、盒内甲骨顺序编号及甲骨片数。随着这批甲骨一起拨交的还有名为《书契丛编》的甲骨拓本共18卷，分订为18册。这18册甲骨拓本每册的编号顺序均与红木盒中的甲骨编号顺序一致，每册拓本后面还附有每片甲骨的释文。刘体智的这批甲骨属私人收藏，是非科学发掘时期的传世品，故没有详细准确的地质关系、出土地点的记录[3]。尽管这些使这批甲骨的考古价值不尽完美，但是和它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收藏价值相比较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更不愧为殷墟科学发掘以前出土甲骨的珍贵部分。它的收藏价值和珍贵程度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说：“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且精，殆为海内外之冠。”[4]由于受施以钻凿和卜灼的影响，加之深埋地下几千年，甲骨出土后很不容易保存，而且易碎。因此用墨拓方法传拓出拓片，再用纸本拓片结合甲骨实物来研究和利用甲骨资源不能不说是最佳的选择。刘体智的这批甲骨有记载的传拓只有三次。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刘体智请人传拓，拓得拓本委托金祖同先生带到日本供郭沫若出版《殷契粹编》之用。这次传拓的特点是拓工手法精湛，墨色黑润有光泽，美中不足的是每遇较大块的甲骨都只拓了有字部分，没字部分一律从有字部分以墨色逐渐淡出作处理。有漏拓有字骨背、骨白的现象。第二次是刘氏所藏甲骨售归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后当年的秋天，时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施大规模传拓甲骨工作的开始，始拓的甲骨就是刘氏的旧藏甲骨，共拓得拓本28本，1341页，并题名为《善斋所藏拓本》，拓本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这次传拓的特点是分别了种属、时代、事类，拓全了甲骨面、背部及有字白部，注明卜辞上涂朱涂墨或其它的情况等。第三次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传拓，拓成的拓片陆续经过整理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次传拓的特点是按馆藏号顺序传拓，要求尽量把甲骨拓全，其中包括了骨面无字部分和有字的骨背和骨白，还对个别甲骨有字部分的水锈进行了去除，对粘连在一起的甲骨进行了剥离，对确认缀合无误的甲骨进行了拼对传拓，而且每块甲骨均拓三份。可以肯定的说最后这次的传拓无论从拓片甲骨文字的清晰程度还是拓片的完整性方面都会超过上两次。这无疑给研究甲骨史料带来极大的方便。

三 郭沫若的《殷契粹编》与刘体智旧藏甲骨

1928年以后郭沫若先生（1892—1978）旅居日本，并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同时受罗振玉著《殷虚书契》影响开始研究甲骨文。1933年5月，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卜辞通纂》。国内的刘体智深知郭氏才识渊博，于1936年3、4月间，委托当时师从郭沫若先生的金祖同（1914—1955）携带自己全部拓本到日本，请郭氏拣选并刊布。最先见到这批甲骨拓本的郭沫若先生见到拓本以后一是对刘体智的旧藏甲骨数量之多，内容之精珍感到震惊，二是对刘体智的深情厚意而感动，三是对金祖同的鼎立之助大加赞许。在经过认真的拣选、研读、考释之后，于次年四月在日本编著出版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殷契粹编》一书。对此郭沫若先生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氏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遭。余即深受感发，不揣鄙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6]对于金祖同的帮助郭沫若先生在他书序言中写道：“祖同金君，亦有志于契学，而拓墨之艺尤精。渡日以来，于此邦藏家所搜甲骨，拓存殆尽，其用力之勤且专，良属后起之秀。本编之成，彼亦有与有力焉。”[7]话语虽短，但简短的话语之间却充满了郭沫若先生对金祖同的赞许和感激之情。在上面《殷契粹编》一书序中有这样一句话：“氏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里的“册凡二十”显然与上一节所述的“甲骨拓本共18卷，分订为18册”是格格不入的。但只要仔细观察了《书契丛编》每卷（册）的顺序编号就不难发现，从第1卷到18卷每张粘帖拓片书页右上角的起止编号是连续的。再观察你还会发现附在每卷后的释文部分的纸张显然与前面的书页不同。更重要的是每册书脊的装订位置还留有旧的装订书眼。事实告诉我们郭沫若先生1936年当年所看到的刘氏拓本确实为“册凡二十册”，不是18册，只不过在这二十册之中有两册是释文。而上一节所述的“甲骨拓本18卷18册”，以及下一节胡厚宣先生所述“《书契丛编》凡18卷，分订18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书契丛编》的甲骨拓本，与盒内甲骨实物先后次序相对照。”是后来不知何人把1936年郭沫若先生看过的两本释文按卷序拆开分别装订于相应的粘帖拓片书页的卷后了。

被郭沫若《殷契粹编》选中并编释的1595片甲骨，全部精选于刘体智的28450片甲骨，它按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分类，被选中的每类甲骨数量虽说是多寡不一，但是却包含了对祖先与自然神祇的祭祀与求告；风、雨、啓、水及天变；年成与农事；与方国的战争、交涉；田猎、游止、疾病、生子；对今夕来旬的卜问等等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殷契粹编》第112片（图一）（《甲骨文合集》32384号）该片是由3片甲骨缀合而成，甲乙两片由王国维先生所缀合[8]，丙片由董作宾先生（1895—1963）所缀合。甲片著录号为《殷墟书契后编》卷上·八·十四；乙片著录号为《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一·十；丙片著录号为善斋603号（北图6006号）。这三片甲骨的缀合，其重要性在于它证实了西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的殷世系表先公先王的排列具有可信性的，同时也发现《史记·殷本纪》中先世“报丁、报丙、报乙”的顺序是错误的，被纠正后的次序应是“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为此，王国维先生早在1917年也就是甲骨发现的19年后就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这是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文中王国维先生首创了用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来从事甲骨研究，把甲骨学研究从“文字时期”推向“史料时期”此举也是以甲骨文证史的滥觞，对此郭沫若先生的评价是：“数千年来史籍之谬误，得此而一举廓清”。又如：《殷契粹编》第114片（图二，善10998号、图16400号、《甲骨文合集》39455号）是一块残的牛肩胛骨，骨上所刻卜辞不全，且文字均缺横画，惟独卜辞中报乙也次于上甲的记录历历在目。如果说《殷契粹编》第112片的例子是偶然的发现，那么此例则应该是必然的了。再如：《殷契粹编》第113片（图三，《甲骨文合集》35406号）是由燕京大学所藏的一片甲骨与刘氏所藏的两片甲骨缀合而成的。甲片为燕京大学所藏（著录于《殷契卜辞》20），乙片为善斋198号（北图5601号）。丙片为善斋12552号（北图17923号）。这片的内容不仅为

王国维前面所缀合的结果增加了新的例证，而且解决了甲骨文中自上甲以来的周祭顺序，还为研究殷代祀谱奠定了基础。以上三例被郭沫若先生誉为“卜辞文献中可云鼎足三者也。”除此之外，郭沫若先生还凭借《殷契粹编》所含的内容，对殷人书法风格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那就是：“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书之契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钟王颜柳”指的是东汉桓帝时的钟繇、西晋惠帝时的王羲之、唐中宗时的颜真卿、唐太宗时的柳公权四位大书法家。而殷代的“钟王颜柳”们，则指的是那些在龟甲兽骨契刻卜辞的人了。正是这些“刀笔吏人”的创作才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留下了一幅幅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刘体智的旧藏甲骨除了著录于《殷契粹编》的1595片外，还有一部分著录于孙海波1940年出版的《诚斋殷墟文字》、李亚农1941年出版的《殷契摭佚续编》、胡厚宣1951年出版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4年出版的《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及1982年全部出齐的《甲骨文合集》。



图一

四 胡厚宣与刘体智的旧藏甲骨

要说对刘体智的旧藏甲骨自然状况谁研究的最精细则当属胡厚宣先生。抗日战争结束后，胡厚宣先生（1911—1995）从大后方成都回到了上海，1947年在复旦大学任教，此后他经常到新闻路上的小校经阁拜访刘体智先生，曾参观过刘氏所收藏的甲骨，也带学生参观过刘氏的藏书、藏器和藏骨。为此他在所著的《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一文中详细写道：“我参观过他收藏的甲骨，也带学生参观过他的收藏。甲骨共装楠木盒100盒，另有甲骨拓本题名《书契丛编》凡18卷，分订18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书契丛编》的甲骨拓本，与盒内甲骨实物先后次序相对照。”^[9]“1961年，为编《甲骨文合集》，我向考古研究所，将《善斋所藏甲骨拓本》借来。1963年，我曾细细地翻看了一遍，发现拓本有缺号2，无字甲骨4，伪片甲骨112，可以拼合的甲骨51，51片甲骨可以拼成24版。这样28292片，减去缺号2，无字的4，伪刻的112，可以相拼合的51片，能拼成24版，片数就减少了27片。这样，减去以上的145片，28292片就剩下28147片，这便是刘体智之善斋所藏甲骨的实际数字。”^[10]鉴于胡先生以上对刘体智所藏甲骨的数量的说法与文前所述的实际收藏有出入，本人就此想纠正一下。（一）国家图书馆实际收藏刘体智旧藏甲骨28450片，这28450片刘氏甲骨是1958年的接收数字，而且与财产帐相符合。（二）在刘氏的旧藏甲骨中确实有一部分可以缀合，对此国家图书馆只是做了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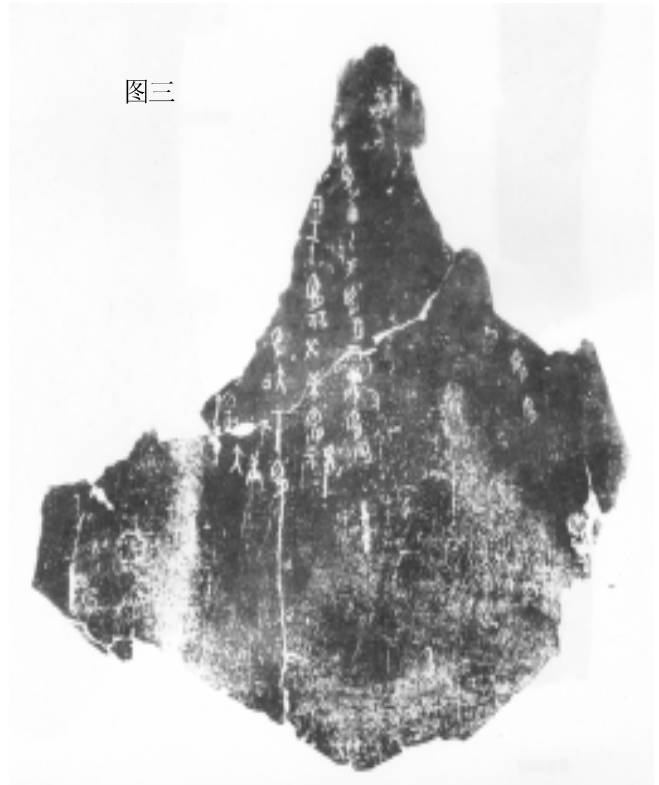
记载，甲骨实物并没有缀合，馆藏数不受其影响。（三）伪刻也在馆藏数中不被减去。在胡厚宣先生《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一文中还说：“我们说《殷契粹编》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像《京津集》520片的四方风名刻辞，和《宁沪集》110、111片的特大牛胛骨卜辞，《粹编》就没有收进。”在这里胡先生对《殷契粹编》漏选善斋精品情况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勾勒描绘，其实以上的精品还是很值得一示的。（一）关于《京津集》520片四方风名刻辞（图四）。这片被著录于《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的甲骨，为善斋7388号（北图12789号、合集14294号），是一块内容为天象的兽骨，其骨长26厘米，宽16厘米。该骨有刻辞4段，应为28字，是有关四方神及风神的记载。刻辞中的东、南、西、北四方之风在《山海经》中《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尚书·尧典》、《诗经·邶风》、《尔雅·释天》等古籍中也都有记述。胡厚宣先生认为：“甲骨文四方风名的写法，虽然与《山海经》不一样，但它们在上古时代肯定



图二

是意义相通或者声音相近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致的。”对胡厚宣先生所为，杨树达在其所著《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序中说：“而甲学诸家能以故书雅记稽合甲文以证明古史者，寥寥不过数人，胡君厚宣其一也。庐江刘氏藏一片，所记为四方风名，君以尚书尧典及山海经诸古书证合之。是其事也，昔王静安以楚辞山海经证王恒、王亥，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也。”^[11]该骨面上刻有“东方曰析，风曰𩇛；南方曰𩇛，风曰𩇛；西方曰𩇛，风曰𩇛；□□□□，风曰𩇛。”等文字，文中第四行文字已残，但从文理上推求，当是“北方曰𩇛”。该骨字体遒整，文气古奥，文理通达，与杜撰不同，应属武丁时期刻辞。可见以上刘氏所藏不仅不是伪刻，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在拓本《书契丛编》第八卷首页甲骨编号为7388号的位置上的拓片只拓了有字部分，并没有拓出该骨的全形，加之这块甲骨内容为刻辞而非卜辞，也就是说骨的背面没有施以钻凿的痕迹。在没有拓全又没有钻凿可作参考的情况之下，给正确判断该骨的真伪程度上增加了难度，进而导致了郭沫若先生对该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片伪刻，所以才没有被选进《殷契粹编》的。(二)关于《宁沪集》110、111片的特大牛胛骨卜辞（图五）。这片被著录于《战后宁沪新获

甲骨集》的甲骨，为善斋2号（北图5405号，合集33747号），是一块内容为卜雨的整肩胛骨。该骨有卜辞24段，正反面共有218个字，其中正面196字，反面22字；有长凿圆钻51个；骨长43.5厘米，宽24厘米。它不仅是刘体智所藏甲骨中，而且也是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中，更是国内外所见字数最多，尺寸最大，最完整的一块兽骨之王。那么郭沫若先生为什么没有选上这块极有代表性的甲骨呢？通过对现存的1936年托金祖同带到日本的那套《书契丛编》拓本的阅读，可以得到以下解释。在拓本《书契丛编》第一册首页甲骨编号为2号的位置上有用毛笔写的“未拓”二字字样。第十二册38页书眉上有“此页为空白·颐·周永珍 29 / 9”的字样；在书页中间空白的地方有用钢笔书写的“据释文所录，知此页原载大骨即丛编0002者。陈. 1955. 7. 27.”这里的落款“颐·周永珍”指的是罗福颐、周永珍先生，“陈”指的是陈梦家先生。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拓本《书契丛编》中根本就没有贴上这张甲骨的拓片，那么郭沫若先生在没有看到拓片的情况下，没把该骨选进《殷契粹编》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如此重要的两片甲骨没有被选进《殷契粹编》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更正的是，在本段落中胡厚宣先生说：“我参观过他收藏的甲骨，也带学生参观过他的收藏。甲骨共装楠木盒100盒，……。”实际上刘体智的旧藏甲骨被分装在150个拉盖式木盒中，木盒盒身选用上好的红木制作，配以用红木作框，核桃木作心的盒盖。这与胡氏所说的木盒材质、木盒数量都有偏差。如果假想，那么其偏差很有可能出现在：当时胡先生并没有记错，而是刘体智的旧藏甲骨在拨交给中国国家图书馆之前用红木盒代替了



图三

楠木盒，这些好在对甲骨的收藏无大碍也就随它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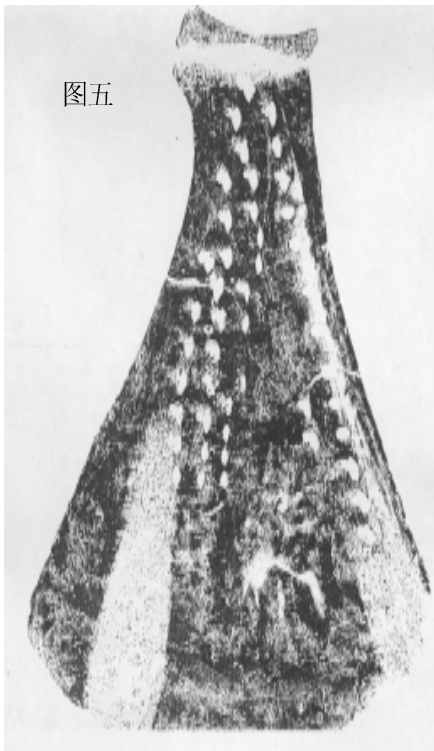
五 陈梦家、罗福葆、罗福颐先生与刘体智旧藏甲骨

在继胡厚宣先生之后见到这批甲骨和甲骨拓本的还有陈梦家先生、罗福葆、罗福颐先生。陈梦家（1911—1966）知识渊博，涉猎范围较广，是中国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浙江上虞人。1932年于中央大学毕业后，在青岛大学、燕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4—194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并收集流散在欧美的商周青铜器资料。回国后，担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在西周铜器断代及简牍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多有创见。从上个世纪30年代陈氏开始研究甲骨学。在甲骨学方面，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甲骨文字考释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能够按照考古学的要求发扬金石学的传统，尽可能科学地整理大量非发掘出土资料，在某些方面达到超越前人的水平”[12]。1956年他在整理了前人和近人的各种成说，并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甲骨文资料，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并结合了自己的研究，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卜辞中各方面的重要内容，完成了70多万字，在甲骨学史上较早且少见的大型综合性著作《殷虚卜辞综述》，

从此把甲骨文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该书注重了卜辞、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互相结合以及卜辞本身内部的联系。为了举证陈梦家先生竭尽全力地搜集了大量的卜辞中的相关内容，这里有诸如：1903年出版的《铁云藏龟》、1913年出版的《殷虚书契前编》、1948年出版的《殷虚文字甲编》等现成资料，当然也包括了1934年4月出版的选自刘体智旧藏甲骨的《殷契粹编》。据不完全统计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包括总论在内的二十个章节中，被标明“善××”、“粹××”而引用的例子超过了2000处，有些卜辞因为文字内容丰裕而被多次多章节利用。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罗氏所编的后编，也有采用别家甲骨拓本的事实。王国维所作《随庵所藏殷虚文字》跋说徐积馀随庵藏骨为数不多[13]，罗振玉‘已选印入书契后编’，此跋作于1920年秋季。这批甲骨后来归于刘体智，郭沫若编录善斋甲骨粹编时曾选用了一部分，因此后编与粹编乃有相同者，其中有一部分即属随庵原藏。刘体智曾将随庵拓本350张见赠，上有随庵所藏图记，乃知后编中颇有随庵原物。”[14]这段话中的“后编”、“书契后编”、“粹编”指的是《殷虚书契后编》和《殷契粹编》。根据以上陈氏之说，就刘体智旧藏甲骨中究竟有还是没有随庵的旧藏甲骨，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整体的梳理：（一）查阅了王国维遗书中有关《随庵所藏殷虚文字》跋的全文及跋文年代。（二）查对了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郭沫若《殷契粹编》的出版年代。（三）在《甲骨文合集》来源表中找出了一块北图（善斋）甲骨分别被《殷虚书契后编》、《殷契粹编》同时著录的情况10例，并进行了核对。（四）摸清了刘体智的《书契丛编》甲骨拓本的分类情况。（五）对北图（善斋）甲骨实物存放位置的布盒进行了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刘体智旧藏甲骨中应该有随庵旧藏甲骨的可能，但需要一定的时间得以确定。其理由是：1.罗振玉刊行《殷虚书契后编》在1916年，王国维作《随庵所藏殷虚文字》跋文在1920年，郭沫若出版《殷契粹编》在1937年。按以上三书的刊行、跋文、出版时间顺序看，说明刘体智1936年3、4月间，委托金祖同携带《书契丛编》拓本到日本时，拓本中已含有被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著录的部分随庵藏骨拓片，有拓片就应该有甲骨，这是一个事实。2.一般认为：有拓片就应该有甲骨，有甲骨就应该有它相应存放位置，有了相应的存放位置也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检验

图四





图五

甲骨的详细内容，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事实不是这样，刘体智在请人传拓自己的甲骨前已经把其进行了分类，它们是：《书契丛编》的卷一至卷四为祭告，卷五为行止，卷六为征伐，卷七为佃渔、疾病，卷八为晴雨，卷九为卜年卜月，卷十为卜旬，卷十一为干支、卜吉，卷十二为卜吉、总类，卷十三至卷十五为杂卜，卷十六至卷十八为杂文。试想即便随庵的 350 片甲骨在刘体智的旧藏之中的话，要从 28450 片中把已经按分类而打乱的随庵的 350 片甲骨逐一找出来是何等的困难。3. 为了找寻刘体智旧藏甲骨中的随庵藏骨的踪迹，我试图从以上所选的 10 个例子（如：北图 5483、善斋 80、粹编 909、后编下 29.15；北图 5886、善斋 483、粹编 472、后编下 39.16；北图 6460、善斋 1057、粹编 254、后编上 3.18；北图 9042、善斋 3641、粹编 1295、后编上 30.4；北图 10621、善斋 5220、粹编 1081、后编上 17.2；北图 12802、善斋 7401、粹编 763、后编上 32.3）中找出一些规律或者线索，但不是因为 10 个例子间因为分类使之彼此间无规律可寻，就是因为北图（善斋）甲骨实物存放位置的蓝布盒中没有丝毫找寻线索而放弃。在《殷墟卜辞综述》写作完成，三校稿校毕后的 1955 年 7 月间至 1956 年的 3 月间，陈梦家先生还仔仔细细、一丝不苟的鉴定和研究了刘体智的甲骨拓本《书契丛编》，并在书眉批处留下了“此伪，陈梦家。”、“正文未拓”、“此册拓本与原物不合，陈梦家 56.3.16。”等珍贵书迹。

罗福葆（1899—1976）字君羽；罗福颐（1905—1981），字子期。为近代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之子。二者均自幼秉承家学，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罗氏二人也许是受其父的影响，或许是对甲骨独有所衷。罗福葆在 1954 年 10 月 11 日至 1955 年 8 月 3 日间，罗福颐在 1953 年 9 月 17 日至 10 月 8 日对甲骨拓本《书契丛编》进行了核对研究，也在书页间和眉批处留下了如“5102 号仅存左半截 罗福葆 1954.10.11.”、“此盒实数四十片，拓片四十二面（有两片背文）四十一片为误。公柔 颐 九.一七。”等内容的书迹。在经过以上三位先生的辛勤劳作之后，核对出了《书契丛编》中有拓片而无甲骨，有甲骨而无拓片，漏拓骨面、骨背、骨白等情况，这不仅对准确计算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实物数量、拓片数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我们研究、开发、利用馆藏提供了方便。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整理工作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以来至今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目前，我们想尽快地传拓完馆藏的全部甲骨，并在甲骨自然状况的最佳时期用先进的影像数据库方法把它整理出来，在更长久的珍藏甲骨的同时，又能让学者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所提供的书目数据库和影像数据库像阅读书籍一样对清晰的高质量彩色甲骨图像进行学术研究。

注释：

- [1]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119 页。
 [2] 伦明等撰，杨琰点校《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年，201 页。
 [3]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35 页。文中曰：“1925 年村人在村南大路旁挖掘，一部分归于刘体智。”
 [4] 郭沫若：《殷契粹编》序，北京科学出版社，1937 年。
 [5]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出版的《历代藏书家词辞典》刘体智条载：刘氏“1953 年将所藏甲骨售归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墨拓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现存北京图书馆。”有误，应以此为准。
 [6] 郭沫若《殷契粹编》序，东京文求堂书店，1937 年。
 [7] 同上。
 [8] 王国维（1877 年—1927 年）浙江海宁人，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史学、甲骨金石学家。
 [9] 胡厚宣：《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殷都学刊》1985 年第 1 期，第 2 页。
 [10] 同上。
 [11] 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杨树达序，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年。
 [12] 周永珍：《怀念陈梦家先生》，《考古》，1981 年第 5 期。
 [13] 随庵，即徐乃昌（1868—1936），字积余，号随庵，室名积学斋，安徽南陵人。一生以藏书、著书、校书、刻书为业，是近代以来著名的藏书家。
 [14]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附录，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655 页。